

導言

1

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的。

——《哥林多後書》六章 9 節

「所有新教徒都是秘密的教宗黨人 (Crypto-Papists)」，俄羅斯神學家科米雅柯夫 (Alexis Khomiakov) 在一八四六年寫給一位英國友人的信中這樣說道。「……使用精確的代數語言來說明，所有西方人只知道一個數 a ；它前面或者是由天主教徒所帶的正號「+」，或者是由新教徒所帶的負號「-」， a 保持不變。現在，通向正教的道路看來就像是背叛過去，背叛它的學科、信條和生活。它正在沖進一個嶄新和未知的世界中。」¹

科米雅柯夫在說到數 a 的時候心裏知道這個事實：西方的基督徒，無論是自由教會派、聖公會教徒，還是羅馬天主教徒，在過去都有着共同的背景。所有人都（雖然他們一直不願承認）被相同的事件深深影響，這些事件有中世紀的教宗集權化和經院主義，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但是在正教會成員——希臘人、俄羅斯人和其餘人的背後，存在着一個非常不同的背景。他們不知道中世紀（西方意義上的），沒有經歷宗教改革或反宗教改革；十六和十七世紀改造了西歐的文化和宗教動盪只是以間接的方式對他們產生

1. 此信刊印於 W. J. Birkbeck, 《俄羅斯與英國教會》(Russia and the English Church), 頁 67。

影響。包含羅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西方基督徒大體上因提出同樣的問題而開始，雖然他們在這些問題上有不同的回答。可是，在正教那裏，不僅僅是有不同的回答——他們的問題本身就不同於西方的問題。

正教以另一個維度看待歷史。例如，考察一下正教對待西方宗教爭端的態度。西方通常認為羅馬天主教和新教是對立的兩極，但是對於正教而言，他們看上去像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科米雅柯夫稱教宗為「第一位新教徒」、「德國理性主義之父」；同樣，他無疑認為基督徒科學家是怪異的羅馬天主教徒。²當他在一八四七年訪問牛津時，一名高教會派（High Church）聖公會教徒向他問道，「我們要怎樣證實新教主義帶來有害的結果？」；他回答說：「除掉你的羅馬天主教。」在俄羅斯神學家的眼中，兩件事情攜手並行；兩者都共享同樣的設定，因為新教主義從羅馬下的蛋中孵化出來。

「一個嶄新和未知的世界」：科米雅柯夫正確地用這樣的方式來談論正教。正教不僅僅是一種沒有教宗的羅馬天主教主義，而且相當有別於西方的任何宗教體系。那些更加密切注視這個「未知世界」的人們將會發現其中有很多東西雖然不同，但卻異常熟悉。「但那正是我一直相信的！」很多人一旦更加充分地認識正教會及其教導，就會做出如此的反應；他們是部分正確的。因為在九百多年裏，希臘語東方和拉丁語西方各自遵循自己的方式，一直穩定地分開發展，雖然在基督教世界的早先世紀中，雙方能找到共同的基礎。亞他那修（Athanasius）和巴西勒（Basil）在東方生活，但是他們也屬於西方；在法國、英國或愛爾蘭生活的正教徒也能將這片大地上的民族聖人——阿爾本（Alban）和帕特里克（Patrick），庫斯伯特（Cuthbert）和比得（Bede），巴黎的

2. 比較P. Hammond，《瑪拉之水》（*The Waters of Marah*），頁10。

吉那維夫 (Geneviève of Paris) 和坎特伯雷的奧古斯丁 (Augustine of Canterbury) ——視為他們自己教會的成員而非外來者。全歐洲都曾是正教的一部分，就像希臘和俄羅斯在今天是正教的一部分。

當科米雅柯夫在一八四六年寫信時，雙方幾乎都沒有人通過個人接觸而認識對方。柯曾 (Robert Curzon) 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穿越雷凡特 (Levant) 旅行，尋找能夠以低廉價格購買的手稿，他吃驚地發現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從未聽說過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情況的確在此後發生了變化。旅行變得無比容易，物理障礙已經消除了。而且旅行不再是必需的：西方世界的公民在對正教會進行第一手觀察時，不需要再離開自己的國家了。希臘人出於自願或經濟需要在西方旅行，遭受迫害的斯拉夫人被驅趕到西方，他們把自己的教會一起帶到了西方，他們在整個歐洲、美國和澳大利亞建立起主教管區、教區、神學院和修道院的網絡。最重要的是，在現今世紀的許多不同教派中，出現一種不可抗拒和史無前例的欲望，欲求一切基督徒實現可見的合一，這已經使正教會產生了新的興趣。恰好在關注再聯合的西方基督徒開始意識到正教的適切性並急於對它有更多了解的時刻，希臘人—俄羅斯人流徙於世界。在再聯合的討論中，正教會的貢獻常常被證明具有始料未及的啟發性：恰恰由於正教的背景不同於西方，他們能夠開啟嶄新的思想線索，提出早已被遺忘的方法應對老困難。

在西方，從來都不缺關於基督教世界的觀念不囿於坎特伯雷、日內瓦和羅馬的人；可是在過去，這些人是在曠野中呼告。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持續了九個多世紀的疏離帶來的後果不可能迅速消除，但至少已經有了一個開始。

「正教會」的涵義是甚麼？造成現今基督教世界支離破碎的分裂主要出現在三個階段，階段的間隔大約是五百年。第一個分離階段出現在第五和第六世紀，我們今天知道東方正教會（Oriental Orthodox Church）在那時從基督徒的主體中分離出去。這些教會分成兩個群體，東方教會（Church of the East）（主要在今天的伊拉克和伊朗；有時被稱為「亞述」[Assyrian]、「聶斯托利」[Nestorian]、「迦勒底」[Chaldean]、「東敘利亞」[East Syrian]教會）；和五個非卡爾西頓教會（Non-Chalcedonian Church）（常被稱為「基督一性論派」）：安提阿的敘利亞教會（所謂的「雅各伯」[Jacobite]教會），印度的敘利亞教會，埃及的科普特（Coptic）教會，亞美尼亞教會和埃塞俄比亞教會。東方教會今天的成員不超過五十五萬人，雖然歷史上曾比現在多得多；非卡爾西頓者總數大約兩千七百萬。這兩個群體常常一起被稱為「少數派」或「分離的」東方教會，但是最好避免使用這樣的稱謂，因為它們蘊含着價值判斷。

此書不求完全涵蓋複雜的東方基督徒，不會直接涉及這些「東方正教徒」（Oriental Orthodox），雖然我們會時不時地提到他們。我們的主題是那些被稱為「東正教徒」（Eastern Orthodox），而非「東方正教徒」的基督徒，也就是那些同君士坦丁堡的普世宗主教共契的基督徒；因此我們提到的「正教會」，是東正教會（Eastern Orthodox Church），而不是東方正教會（Oriental Orthodox Church）。幸運的是在我們當今時代，東方正教和東正教這兩個基督徒族系，有很大的希望實現完全和解。

第一次分裂導致東正教在其東面開始受到限制，主要局限於希臘語世界中。接下來是第二次分裂，按傳統說法是發生在一〇五四年。基督徒的主體現在被分為兩大團體：在西

歐的是羅馬教宗治下的羅馬天主教會；在拜占庭帝國的是東正教會（Eastern Orthodox Church）。正教現在在其西面也受到限制。羅馬和宗教改革者之間的第三次分裂發生在十六世紀，這不是此書的直接討論對象。

文化分裂和教會分裂趨向於重合，這是一個有趣的發現。基督教雖然具有普世的使命，但是在實際上同閃米特、希臘和拉丁三種文化聯繫在一起。第一次分裂造成有着成員為神學家和作家的興盛學派的敘利亞閃米特基督徒，同其餘 5 的基督教國（Christendom）相割離。其後的第二次分裂，在基督教國的希臘和拉丁傳統之間釘入了楔子。所以結果就是東正教在文化上主要受希臘影響。但是一定不能就此認為正教會除了是希臘教會以外甚麼都不是，因為敘利亞教父和拉丁教父也在整個正教傳統中佔有一席之地。

雖然正教會首先在東面，然後在西面受到限制，但它擴展到了北部。斯拉夫人的使徒聖西里爾（St Cyril）和聖美多迪烏（St Methodius）在八六三年向北旅行，越過拜占庭帝國的國界進行傳教工作，他們的努力最終帶來保加利亞、塞爾維亞、俄羅斯的皈依。隨着拜占庭勢力的衰落，這些更加嶄新的北方教會的重要性逐漸提高。君士坦丁堡在一四五三年被土耳其人攻陷，莫斯科公國開始取代拜占庭的地位，成為正教世界的保護者。在上兩個世紀中，情況發生了部分的倒退。雖然君士坦丁堡本身仍然被土耳其人掌控，它昔日光輝的暗淡陰影，希臘的正教基督徒在一八二一年開始重新獲得自由；另一方面，在一個激進的反基督教政府的統治下，俄羅斯教會在二十世紀中遭受了七十年的磨難。

上述是決定正教會外部發展的主要階段。從地理上說，它的主要分佈地區位於東歐、俄羅斯和地中海東面沿岸。目

前它由下面的自治或「獨立」教會組成：³

6 (一) 四個古代宗主教區：

君士坦丁堡 (600 萬)

亞歷山大 (35 萬)

安提阿 (75 萬)

耶路撒冷 (6 萬)

雖然這四個教會在規模上縮小很多，但是由於歷史原因而在正教會中具有特殊地位，享有頭等榮譽。這些教會的首領擁有宗主教 (Patriarch) 的頭銜。

(二) 其他九個獨立教會

俄羅斯 (1 億至 1 億 5 千萬)

塞爾維亞 (800 萬)

羅馬尼亞 (2300 萬)

保加利亞 (800 萬)

格魯吉亞 (500 萬)

塞浦路斯 (45 萬)

希臘 (900 萬)

波蘭 (75 萬)

阿爾巴尼亞 (16 萬)

除了波蘭和阿爾巴尼亞，在其他七個教會所在的國家，全部或大部分基督徒均為正教徒。希臘和塞浦路斯教會說希臘語；其他四個——俄羅斯、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波蘭教會說斯拉夫語。俄羅斯、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教會首領的宗主教頭銜為世人所知；格魯吉亞教會的首領被稱為大公宗主教 (Catholicos-Patriarch)；其他教會的首領被稱為大主教 (Archbishop) 或都主教 (Metropolitan)。

3. 每個教會後面給出近似的估計數字。同所有的教會統計數據一樣，這些數字應該被謹慎對待，無論如何，它們只是粗略的比較性指導。大部分數字指的是受洗成員數目，而不是積極參加正教實踐的成員數目。

(三) 此外還有幾個雖然絕大部分自治，但非完全獨立的教會。這些教會被稱為「自治」教會，而非「獨立」教會：

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 (5 萬 5 千)⁴

西奈 (900)

芬蘭 (5 萬 6 千)

日本 (2 萬 5 千)

中國 (? 1 萬至 2 萬)

(四) 除此之外尚有大量正教徒「流徙」於西歐、北美 7 及南美、澳大利亞。這些「散佈於國外」的教會大部分在管理權上依賴於某個宗主教區或獨立教會，但在一些地區有自治的趨向。尤其是美國的正教會 (大約一百萬人) 已經逐步開始建立獨立教會，但是沒有得到其他大部分正教會的正式認可。

正教會因此是一個自治教會的家庭。維持團結的力量不是一個集中化的組織，不是一個對全體成員行使權力的大主教，而是一致的信仰和共融的聖禮這兩個紐帶。每個宗主教區或獨立教會儘管是獨立的，但在所有教義事務上同其他教會完全一致，他們之間在原則上有完全的聖禮共融。(事實上聖禮共融有被違背過，特別是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正教徒中，但這種情況是例外，而且我們希望是臨時性質的違背。) 正教中沒有誰的地位等同於羅馬天主教會中教宗的地位。人們知道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是「普世」宗主教，自從東西方的教派分裂之後，他在所有正教團體中享有特殊尊榮的地位；但是他沒有權利介入其他教會的內部事務。他的地位類似於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全世界聖公會團體中的地位。

獨立地方教會的去集中化的體系具有高度靈活性的優

4. 某些正教會認為其是獨立的。

點，容易適應變化的環境。地方教會能夠被建立、被壓制、被再次恢復，對作為一個整體的教會生活幾乎沒有干擾。許多地方教會也是國教（national churches），因為在過去的正教國家裏，教會和國家通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雖然一個獨立

8 立的國家常常有其自己的獨立教會，但是教會的邊界不必同國家疆界相重合。四個古代宗主教區的領地在政治上分屬幾個不同國家。正教會是地方聯盟，但絕不是國教。它不把國教的政治原則作為自己的基礎。

可以看出，不同的教會在規模上有巨大的差異，俄羅斯教會是一個極端，西奈教會是另一個極端。不同的教會在年齡上也有差異，一些教會可以追溯到使徒時代，而另一些教會只略長於一代人。例如阿爾巴尼亞教會一九三七年才獨立。

正教有普世的聲稱，即不是異國的和東方的，而只是基督教。由於人為失敗和歷史事件，正教會在過去主要局限在一定的地理範圍內。可是對於正教徒自身來說，他們的教會不僅僅是地方性群體。「正教」一詞具有「正確信仰」和「正確榮耀」（或「正確敬拜」）的雙重含義。因此，正教提出的要求乍一看令人吃驚：他們認為自己的教會保衛和教導關於上帝的正確信仰，用正確的敬拜來榮耀上帝，也就是說，完全是基督在地上的教會。如何理解這一主張，正教徒如何看待不屬於他們教會的基督徒，是本書將要解釋的一部分內容。

